

试论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

李若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市 100007)

摘要:日俄之间的南千岛群岛问题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往往领土问题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南千岛群岛问题也不例外。17世纪以前的俄罗斯还是一个领土只限于欧洲的国家,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俄罗斯开始奉行向远东扩张的政策,最终使其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却开始执行锁国的政策,寄望通过把自身封闭起来以免受来自外部世界的侵扰,从而完全忽视了俄罗斯进入远东这一足以影响东亚格局的重要动向。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外交理念,为19世纪前日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为两国间的南千岛群岛问题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日本;俄罗斯;锁国;漂流民;日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59-08

近年来,日俄之间的南千岛群岛问题作为当下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热点,日益受到我国学者的瞩目。日俄间的领土问题看似肇始于1855年两国签署不平等的《日俄友好条约》所划定的国界^[1],但实际上条约的签订非但不是问题的开始,而且恰恰相反,订立条约正是由于两国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而遭遇瓶颈,最终彼此做出调整的产物。所以要探寻日俄领土问题的根源就必须回到日俄两国发生接触的源头,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梳理。

17世纪初,本来作为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开始逐步向远东扩张。到彼得一世时期,俄罗斯谋求建立横跨欧亚大陆帝国的计划已成为其既定国策。正是在这种不断向远东扩张的活动中,俄国主动试图与日本进行接触。此时的日本却还沉湎于通过“锁国”所建立的“小华夷秩序”中,对外界的情况不闻不问。可以说正是双方“锁国”与“扩张”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决定了在之后百余年里日俄关系的长期走势。因此对日本“锁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评析就成为研究早期日俄关系最重要的课题。

一、日本“锁国”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其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庆长八年(1603年),随着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并于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了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日本藩幕体制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被称作“锁国”的外交制度。其实我们今天通常所用的“锁国”一词并非由当时的日本人所创,“锁国”之意最早出于荷兰人恩格尔伯特·坎培尔所著的《日本志》。荷兰是在江户时代唯一与日本保持联系的西方国家,因此恩格尔伯特·坎培尔这本德语著作也就成为当时西方了解日本的重要窗口,而先后被翻译成英语、拉丁语和他本人的母语——荷兰语。在《日本志》第6章中,坎培尔指出:“日本帝国对本国人出海、外国人入国及其他国家与日本交流的禁令是有其理由的”,上述对日本外交政策的概括就成为“锁国”一词的雏形。“锁国”两个汉字

* 收稿日期:2013-05-10

作者简介:李若愚,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

连用则要到1801年日本兰学家志筑忠雄对《日本志》的日译本中才正式出现,志筑忠雄把对原书第6章的翻译题名为《锁国论》。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志》德文原版中对“锁国”原本是报以理解的,但由于误译之故,荷兰语版本却呈现出了一种对“锁国”质疑的态度,而志筑忠雄所采用的又恰恰是这个错误的荷兰语版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锁国”一词的产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译者根据自身所处时代历史的发展而加入的个人价值判断。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如果志筑忠雄阅读的是德语原版的话,他很可能是不愿翻译这本书的。”^[2]

倘对“锁国”一词望文生义,难免会产生一种闭门自守、与世隔绝之感。据此,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出于对旧时代批判之目的大量使用了“锁国”的提法,并对锁国体制导致的因循守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后世学者却指出:“实施‘锁国’的17世纪,并没有‘锁国’一词,也并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国家已被封锁起来。”^[3]

与乾隆帝自认“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闭关自守不同,日本奉行锁国政策并非出于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在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为了侵略朝鲜的需要,日本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国外状况的情报,经过“文禄庆长之役”后,战争的洗礼更使得日本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德川家康还将漂流到日本的英国水手亚当斯(William Adams)收为家臣,并改名三浦按针,充作自己的外交顾问。可以说在德川幕府建立初期,日本对外了解的程度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恰恰就是在此背景下,日本却开始奉行锁国政策。

上述情况看似是一种悖论,但笔者认为日本的锁国正是基于对国外情况充分的了解,从而深刻地意识到来自西方的外部势力对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的潜在威胁。其实早在丰臣秀吉主政时期,就已针对天主教对日本传统“神国”理念的挑战颁布了《伴天連追放令》(也称《驱逐传教士令》。日语中“伴天連”或“バテレン”源自葡萄牙语的“padre”,后来泛指基督教和基督徒,但在“バテレン追放令”中所指仍为传教士)。但由于当时葡萄牙采取的是“商教一致”原则,当面临葡萄牙商馆提出的中断生丝贸易的压力时,日方最终选择了屈服,实际上驱逐传教士的命令并未真正得到执行。但西方国家动辄以中断贸易相威胁的强硬做法却令日本的统治者对天主教势力对本国的渗透更加忧虑。而奉行“商教分离”政策的荷兰和英国作为日本市场的后来者,为了打压已在日本市场占有相当份额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向日本介绍海外局势时甚至不惜采取诬告的手段,夸大天主教国家对日本的威胁,这更加重了已成为日本实际统治者的德川幕府对外国势力的疑虑。荷兰使者亨德里克(Hendrik Brouwer)1610年12月18日向德川家康提交的荷兰国王的国书中就提到: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日本大力弘扬耶稣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成为它们的海外殖民地^[4]。英国也在1615年通告幕府:“西班牙国王以暴力篡夺葡萄牙国王之位,逐其子嗣,而对其他国家亦有类似之行为。而今或将对日本采取同样行动,以伴天连煽动百姓谋叛加害,望贵下务必注意。”^[5]虽然西班牙传教士中确实有人向本国国王建议:“进入如此广大而繁荣的地区(日本)对陛下之利不言而喻……但其国城郭坚固……如武力入侵确有困难,或可尝试通过我等宣传福音以使彼等臣服陛下”^[6],但其实并无确凿证据表明西班牙国王已根据相关建议制定了入侵日本的计划。然而“曾参杀人,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英荷两国的不断告诫使得刚刚统一日本的德川幕府深深地陷入到对外来势力颠覆威胁的恐惧中。幕府在元和二年(1616年)八月八日,开始禁教并对外国船只在日本停靠设限^[7]。正如北京大学孟晓旭先生所言:“德川日本实行海禁政策的目的是巩固政权,而打出的政治口号则是禁教。”^[8]

其后日本对外国的限制逐步加强,最终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在1633年至1639年的7年间连续颁布了五道“锁国令”,使得日本正式进入锁国时代。锁国令一方面对外国人员及船只来日做出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同时也禁止日本本国的人员及船只出境。尤其是在宽永十二年(1635年)九月,要求长崎奉行强化管制的指示(第三道锁国令)中明令:“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凡归国者可以死罪论处。”^[9]锁国令颁布以后,日本与西方的联系仅限于在长崎出岛开设商馆的荷兰。此时的日

本如同居住在一所坚固的堡垒里,虽然可以通过仅有的一扇窗户窥探外面的世界,却也错失了更多的景色。“锁国”使得日本对外国的了解日益贫乏,从而忽视了17世纪末开始崛起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已在逐步向远东逼近。

二、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逐步扩张

在日本逐渐走向锁国的17世纪初,欧亚大陆上也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革。随着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于1613年继承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王位,俄罗斯进入了罗曼诺夫王朝时期。1612年11月,俄罗斯刚刚从波兰手中夺回了首都莫斯科,然而波兰对俄罗斯的威胁却未完全消失,西北一线的瑞典也是虎狼之国,可以说俄罗斯在西线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瓶颈。而常年战乱已使得俄罗斯满目疮痍,国家财政也濒于崩溃,对外扩张成为谋求国家复兴的唯一途径,这时俄罗斯的统治者便把目光放到了遥远的东方。仅1610年到1640年的30年间,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已从鄂毕河推进到鄂霍茨克海岸,尽管这种扩张主要是以探险和征服为主,还未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但俄罗斯的前线已向东推进了3000英里却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东扩,俄罗斯对远东的兴趣也日趋浓厚,沙俄统治者开始尝试利用各种手段来搜集远东的相关资料。就在此时,“日本”首次出现在了俄罗斯人的视野之中。俄罗斯对日本的最初认识是依靠1637年译成俄文的荷兰地图学家默卡特(Gerhardus Mercator)所绘制的地图。1670年默卡特的《宇宙志》也被翻译成俄语,该书中题为《关于日本或日本岛》的部分,对日本的整体情况作了粗率而极不准确的描述。而俄国政府却正是在这份不甚正确的纪录基础上形成了最早的关于日本的官方文件。1675年5月,俄国政府为扩大在远东地区的影响,派遣斯帕法里以大使之名出使清国。在斯帕法里临行前,沙俄政府依据《宇宙志》中描写的远东的情况,向其发布了一条训令,其中提到日本“是一大岛,位于中国以东七百俄里,盛产金银和其它财宝。”^[10]正是出于这种对日本富庶程度过高估量的错觉,俄罗斯对日本这个传说中的国家抱以了极大的兴趣,从侧面了解日本的情况也成为斯帕法里访华的重要使命之一。斯帕法里在归国以后将自己沿途所收集到的关于远东的情报整理为《中华帝国志》一书,并将其呈现给沙皇,该书第58章即题为《关于大日本岛的记述》。但由于该书除了斯帕法里的见闻外,主要的资料都来自当时身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口述及他们用欧洲文字撰写的著作,而斯帕法里本人既未亲自到达日本,也未与日本人有直接的接触,所以该书关于日本的记述仍存在较大的讹误。比如书中记道:“那里(日本)还住着一些葡萄牙人和耶稣会教士”、“经常有许多葡萄牙人去日本经商”^[11]。而实际上早在1639年德川幕府颁布的第五道锁国令中,日本就已禁止除荷兰外的欧洲国家派遣商船来日,更有日本学者明确提出:“锁国是以禁止葡萄牙船只来日而完成的”^[12],在斯帕法里访华的17世纪后半叶,“在日本仍出现大批葡萄牙商人”的提法无疑是无稽之谈。由此可见这时俄罗斯对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雾里看花的阶段。

在1697年,俄日两国人员实现了第一次直接接触,因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把这一年视为俄日正式关系的起点。^①自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来,“在莫斯科公国的财政和外贸中,动物皮毛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13],沙俄政府为了扩展在东方的势力以垄断远东的毛皮资源,而向该地区派遣了大批的探险队。1697年,由阿特拉索夫率领的堪察加探险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奔赴远东的旅程。同年,向勘察加进发途中的阿特拉索夫在依恰河畔遇到了一个漂落至此的“异邦人”。异邦人自称传兵卫^②,还说自己的祖国遍地金银,这极大地引起了阿特拉索夫的兴趣,于是便要

^① 如中国学者周启乾的《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日本学者真锅重忠的《日俄关系史 1697—1875》及苏联学者法因别尔格的《俄日关系(1697—1875)》,可以说这一说法已成为中、日、俄三国学者的共识。

^② 俄方文献中记载的只是“传兵卫”的音译,直到上个世纪有学者对保存在现俄罗斯国家古代文献档案馆中传兵卫自述的签名部分作了分析,辨认出该签名为“传兵卫”三个汉字的草书,“传兵卫”的大名才最终水落石出。可参见高野明:《日本和俄罗斯——两国交涉的源流》,纪伊国屋新书,1971年版,第55页。

其带回俄国,但由于天气恶劣,当时并未成行。直到1700年6月3日,阿特拉索夫才克服了重重障碍,把这个“异邦人”带到了雅库茨克。当地的长官认为阿特拉索夫所汇报的关于传兵卫家乡的情报极其重要,当即命阿特拉索夫把这一情况上报给莫斯科。1701年2月10日到达了莫斯科的阿特拉索夫向西伯利亚官厅报告了自己勘察加之行的情况,该报告指出:“发现一容貌酷似希腊人的异邦人,该人自称印度(江户)人^①,其国富有金银,殿宇豪华。印度国王(江户的将军)所居用银所筑,又施以金箔。从该人处还得到一枚银币,据称就是印度(江户)的流通货币。”^[14]同年12月,历尽磨难的传兵卫终于来到了莫斯科。此时已经粗通俄语的传兵卫,用俄语向西伯利亚官厅介绍了日本的概况。在这份最终完成于1702年1月的报告书中,传兵卫除了介绍其个人经历外还谈及了日本国内外的基本情况。虽然该报告对于日本外部世界的记述充满了各种谬误,但这恰恰反映了锁国以后日本普通民众的对外认识。比如在报告中提到:“日本人是不会被允许前往国外的。外国人中也只有德国人可以在长崎居住并于此地与日本通商,而他们也禁止前往日本的其它城市。至于日本奉行上述政策的原因,则他(传兵卫)全不知情。”^[15]“他对于雅加达、台湾、广东的情况不但不知,甚至闻所未闻。日本国内没有耶稣会士或德国的神父,至于在长崎是否有传教士生活,他也全然不知。”^[16]正是根据这份报告书,俄罗斯才首次了解到了日本的锁国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语言沟通的障碍,传兵卫的报告在增进了俄罗斯对远东认识的同时也起到了误导的作用。依照传兵卫的说法:“日本和中国(秋田)间不仅有海路,更有陆路相连”,甚至其还亲身经海、陆两路到达过中国(秋田)。^②但这样一份充满讹误的报告书却激发了被后世称为“开启了俄国历史新时代”的彼得大帝的兴趣,因此他在传兵卫刚刚到达莫斯科不久的1702年1月8日,就迫不及待地召见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异邦人”。在听取了传兵卫对远东情况的介绍以后,彼得一世命令西伯利亚官厅在尽快教会传兵卫俄语的同时,派遣3到4名俄国青年向其学习日语,对日语学习的重视也反映了彼得一世主动寻求与日本接触的长远目标。1710年又有一艘日本遇难船只漂流到了堪察加半岛,幸存的被称作“撒尼玛”^③的日本漂流民在1714年被送到圣彼得堡成为传兵卫的助手,直到1734年其去世为止,都在异邦担任着传授日语的工作。而就在“撒尼玛”去世以后不久的1736年,在他长期任教的圣彼得堡,成立了俄罗斯最早的日语学校,可以说传兵卫和“撒尼玛”是日语教育在俄罗斯的先驱。

彼得一世自主政起,便对远东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1711年7月,俄罗斯在普鲁特河附近败于土耳其之手,令彼得一世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在西线的扩张必将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而来自远东的报告使其在东方看到了一线曙光。在保持西线稳定的同时加紧向压力相对较小的东方扩张已成为了俄罗斯的既定国策,因而沙俄政府开始频繁在远东展开各种勘查活动。彼得一世甚至在去世前三周,还亲自部署了第一次太平洋探险活动。他在给海军参议会的敕令中着重强调:“要在舰队中安排熟知到日本为止的北方航路的海员,如果本国无人能胜任可向荷兰征求适当人选”^[17],足见日本在其远东计划中的重要地位。但上述命令也同时反映出俄罗斯在刚刚向远东进军的初期,即便从日本漂流民口中得知了部分关于日本的信息,但由于缺乏直观认识,其对日本的了解仍远远不及作为日本“通商国”的荷兰。^④彼得一世之后的历代沙皇也都十分重视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因此在几乎所有远东探险的报告中都有相当篇幅是关于日本状况的。而俄罗斯对日本的了解也正是通过这种直观的实地考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1742年在俄罗斯海军军官内部的一封信件中提到:为了达到探索日本的目的,“在航行到日本沿岸后,要尽可能沿着陆地航行以寻求交流的机会。如

① 日语发音中的江户(Edo)与印度(Indo)接近,此处应为江户之误。但会产生如此谬误,已足见当时俄罗斯对日本了解的匮乏。

② 俄语中的中国 Kitai 与日语的秋田 Akita 相似,此处中国所指应为日本的秋田,因此才有所谓“陆路相通”一说。《传兵卫报告书》,平川新编:《从俄罗斯史料看18—19世纪的日俄关系 第3集》,东北亚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27页。

③ 疑为“三右卫门”之误。

④ 日本“锁国”后所建立的“大君外交体制”中,以朝鲜、琉球作为“通信国”,以中国、荷兰为“通商国”,这四个国家就成了锁国时期日本了解外界的窗口。

果遇到日本的海难者务必要进行救助,并以送还他们为借口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18]足见为了实现对与日本政府的接触,俄罗斯是有备而来的。并且其对日本奉行的“锁国”政策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日本非但自身不会对遇难者施行救助,并且被救助的人也会被视为死者而不被接收。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可以让他们自行登岸返乡。在发现海难船只时,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友好的态度来打开亚洲根深蒂固的封闭意识。”^[18]上述针对“锁国”而提出的攻心策略表明,经过常年摸索,俄罗斯的对日政策已日趋成型。

三、日俄政府的直接接触及其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

与俄罗斯对日本的强烈兴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为止,日本对于作为北方邻国的俄罗斯几乎毫不关心,更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认识”^[19]。虽然早在1695年西川如见就在《华夷通商考》里就提到过名为“莫斯科未亚”的国家^①,但却并未在日本国内引起重视。直到俄国的大举东进开始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日本才切实意识到了这个已成为北邻的帝国的存在。宝历九年(1759年)七月,被派往厚岸进行贸易的松前藩吏凑觉之进第一次听说:早在三年前曾有一艘载有百余名船员的异国船只在厚岸登陆,该船离开时不但掳走了3名当地妇女,还鸣炮示威。这时日本才知道已有其他国家也进入了千岛群岛,但“锁国”以来对外界事物麻木不仁的积习,使得幕府对上述消息置若罔闻,这使得日本丧失了一次认识俄国的良机。

直到1771年,一封来自长崎荷兰商馆的信件才真正让俄罗斯向东方挺进的意图受到日本国内的关注。在这一年,1768年因参加波兰旧教徒反抗沙俄战争而被俘的匈牙利人比奥尼奥夫司基逃离了勘察加的流放地来到了日本。比奥尼奥夫司基到达日本之后多次致信长崎的荷兰商馆,希望提醒日本:“俄罗斯在千岛群岛建起了一个要塞,并已备齐弹药、大炮,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20]虽然他的警告遭到了幕府的“默杀”,但却在日本的知识界引发了极大的反响,由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著名学者所倡导的“为防止俄罗斯南下,要尽早对虾夷进行开发”的“海防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中林子平因为针对海防提出了具体的国防政策而最为著名。他根据从荷兰商馆馆长海特那里得到的信息,完成了《三国通览图说》及《海国兵谈》两部“海防论”的代表性著作。尤其在《海国兵谈》中,林子平明确提出了“要占领虾夷以对抗‘莫斯科未亚’的南下”^[21]。

就在日本刚刚认识到沙俄的南下威胁之时,俄罗斯已经着手准备把千岛群岛纳入到自己的版图。当时的俄罗斯正处在彼得大帝之后又一位中兴之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之下。正如周启乾先生所说,“1762年登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使沙俄的对外侵略扩张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2]。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扩张已不仅仅以单纯的地理发现为目的,开拓猎场、发展贸易等经济活动越来越成为俄国对外扩张的主题,商人在远东探索中开始扮演起重要的角色。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皇位刚刚稳固下来不久,就向海军参议会发出敕令,要求以对太平洋上新发现的岛屿进行调查和开发为目的,向远东派遣一支远征军^[23]。经过多年的渗透,1779年她正式向杜马提出:“女皇陛下为维护成为了(俄国)臣民的千岛群岛居民的自由,不会向他们收取任何税赋。今后也不会向他们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而是要凭借友好交流的善意来维持和他们的关系,以促进毛皮事业和贸易的发展。”^{[23]101}这种看似友好的姿态,实际上宣告了千岛群岛居民的“国民待遇”。1787年,俄罗斯海军针对本国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命令穆罗夫斯基大校:“要把从日本到勘察加半岛最南的沃帕特卡角间的大小岛屿都作为千岛群岛记入地图,从松前岛到沃帕特卡角间岛屿都应正式标注归

^① 原文写作“ムスカウベヤ”,据周启乾先生考证该词出自荷兰语 moskovia,意为“鞣皮”,系荷兰人将莫斯科即俄国的物品带来日本,其中尤多毛皮,故此得名。周启乾:《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俄罗斯所有,同时要尽可能在合适地点建立刻有俄语及拉丁语的标记。”^①这昭示着俄罗斯正式把千岛群岛划归自己的版图。^②

当俄罗斯通过占有千岛群岛北部在远东站稳脚跟以后,开展对日贸易就成为了其远东政策的下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沙俄开始寻机与日本进行政府间的正式接触。由于熟知日本的锁国政策,沙俄为了寻找与日本接触的借口而费尽心思。就在此时,一批来自日本的漂流民使得这一问题迎刃而解。这批遇难者是来自日本伊势白子村的水手,为首的名为大黑屋光太夫。光太夫一行是在1783年12月24日取道海路驶往江户的途中遭遇暴风而遇难的,他们于1784年7月31日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姆齐特卡岛登陆,几经周折后在1789年1月30日终于到达了伊尔库茨克,此时仅存6人。来自芬兰的博物学家K.G.格拉斯曼在了解到光太夫一行的情况后,于1791年3月向沃伦采夫伯爵进言,“如果能用我国的运输船或者商船把他们送回松前,我认为这将成为我们与日本展开交流的最好的契机。”^③K.G.格拉斯曼的提议最终得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批准,1791年9月24日,女皇正式命令伊尔库茨克总督皮尔组建护送光太夫还乡的“日本探险队”。根据女王的命令探险队务必要在“送光太夫一行回国期间,将书信递交日本政府,向日本政府表示问候,并陈述光太夫遇难经过及宣扬俄国对遇难人员的帮助。要向日本表明如果两国能建立商贸往来,我们将非常高兴为来到我国的日本人提供庇护”^[24]。

1792年10月,K.G.格拉斯曼的儿子A.K.格拉斯曼率领远征队及光太夫等幸存的漂流民到达根岸。A.K.格拉斯曼在登陆之后就向根岸当地的松前藩吏递交了一份用俄日两种语言书写的信函。信中表示:“我是受女皇及皮尔总督委托的使节,奉命将遇难的光太夫等人及记载有他们遇难经历的书信上呈大日本国中央政府”,“因已至深秋时节,所以需在此越冬”,“希望能将此情况反映给贵国的中央政府。”^{[25]178-179}第二年的7月,A.K.格拉斯曼及幕府派来的官员在松前举行了会面。见面伊始,幕府派来的石川忠房、村上义礼两位宣谕使就以俄方带来的书信无法辨认为由将其退回。然后提出“自古以来,我国的法律坚如磐石,从无更改。”所以要秉承锁国旧法对此事进行处理。“我国历来只批准荷兰人在长崎登岸,而绝不允许外国船只停靠内地……念在尔等远道而来,不明法度,今准许离去,但以后绝不可再来,更不能在此靠港。”“如果尔等确希望能与我国订交,并开展贸易,在长崎有专人负责此事,汝可亲赴交涉。”^{[25]180-181}由于日本坚守锁国政策,日俄中央政府间的第一次直接会面最后无果而终。

其实在日本政府给格拉夫曼的宣谕中曾暗示“如果前往长崎就有开通贸易的可能”,但十年以后俄国使节列札诺夫来到长崎之际,主持幕政的松平定信却断然派人拒绝了俄罗斯的通商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认识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格拉夫曼来日以后,日本对俄罗斯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而这一变化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幕府为防止俄国的影响在日本扩大,将光太夫和一同回国的矶吉软禁在了江户。在此期间派了兰学家桂川甫周向他们了解海外的情况,并留下了十四卷的《北槎闻略》。作为日本人撰述的第一部关于俄罗斯的专著,《北槎闻略》大大增进了日本的对俄认识。第二,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员的直接接触,日本确认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已经进入千岛群岛的情况,进而开始大力整顿海防。“宽正十一年(1799年),幕府为经营虾夷地区,向南部、津轻两番下令,命令其派兵驻守虾夷地各要冲”,同年11月2日,幕府又下令两藩增兵,“津轻藩兵在砂

① 引自日本外务省、俄罗斯外交部合编:《关于日俄领土问题历史的共同资料集》,1992年,第9页。该资料集是1992年3月20日,日俄两国第一次外长会议时决定编写,同年9月29日由两国共同发表的。<http://www.mofa.go.jp/mofaj/area/hoppo/ryodo.html>

② 但由于忌惮日本的反应,及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抵抗,俄罗斯实际控制地区基本限于千岛群岛北部。

③ 关于光太夫经历的史料引自近年新翻译成日语的格拉斯曼给沃伦采夫伯爵的书信,平川新编:《从俄罗斯史料看18—19世纪日俄关系第2集》,东北亚研究中心,2007年版,第162页。上述记述与真锅重忠先生和周启乾先生所采用的旧有日文史料相比,在具体时间上有一定出入。因为格拉斯曼的书信是关于光太夫最早的文字记载,所以本文采信这封俄文信件的说法。

原以东,南部藩兵在浦河以东执勤,警卫之法遵从黑田和锅岛两家在长崎之旧例。其后二藩在箱馆设置军营,南部藩在根室、国后、择捉,津轻藩在砂原合择捉分别设立哨所警戒。文化元年(1804年)4月,更任命两藩为永久性的守卫。”^[26]而在日本外务省与俄罗斯外交部联合制作的资料集中,日方也以此作为本国最早获得对南千岛群岛实际控制权的重要证据。可以说通过与沙俄人员的正式接触,日本对俄罗斯的态度从以往的“茫然无知”过渡到了“主动防御”的阶段,但却仍然没能摆脱“锁国以自保”的传统外交理念的窠臼。

反观俄方,其国自上而下无不因为实现了与日本的首次官方正式接触而深受鼓舞。虽然格拉斯曼一行未能实现对日通商的预期目的,但回国以后还是受到了高度的评价。远征负责人伊尔库茨克总督皮尔不但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建议应继续开展远征,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设想:“由希望对日通商的全体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商人共同建立一家公司”,“(通过公司的建立)发展对日贸易,必将为女王的领地太平洋发展做出贡献”,“随着事业的发展,俄罗斯人在远东的活动也会随之增多,而当地居民耳濡目染我国的风俗习惯,逐渐适应之后也将成为陛下忠实的臣民”^[27]。这种以“经济开发为先导,进一步获得领土利益”的公司模式也是未来沙俄殖民机构“俄美公司”的雏形。据此可以看出,沙俄通过双方人员的正式接触更加坚定了其继续向远东发展的决心,并且还为此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措施。

针对格拉斯曼来日这一事件,日俄两国分别做出了“一守”、“一攻”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这实际上正是双方外交理念的差异所致。对于18世纪远东之变局,日本采取的依然是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试图通过自我隔绝来逃避时局之变,然而最终只是闭目塞听而已。沙俄帝国则推行扩张政策,积极向远东渗透,主动求变,谋求主导局势的发展。日俄双方第一次的正式官方接触不但没有改变两国外交的既定策略,反而使得各自的外交理念得到了强化。这种“日守俄攻”的形势,也为直到明治维新日本走上开放道路前的日俄关系定下了基调。

四、结 语

在19世纪以前的日俄关系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日本通过“锁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内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在外来势力面前越发缺乏安全感而极力回避与外界的联系。可以说正是“锁国”政策阻碍了日本对俄认识的进程。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日本的“锁国”却对俄罗斯的对日认识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无论是最初通过传兵卫了解到了日本的基本情况,还是后来借送还光太夫之名与德川幕府进行直接接触,漂流民成为俄国对日活动的重要助力。而漂流民的大量出现恰恰是“锁国”政策的结果。日本在江户时代之前造船业与海运业都是比较发达的,在海外贸易被禁止以后,日本的海运开始转向近海航路。但由于“锁国令”严格限制制造500石以上可以出海的大船,所以日本的近海航运业不得不大量启用航行能力较差的小船,而日本周边海域因常受台风影响,海情多变,这就造成了“锁国”以后海难频出的现象。“在江户时代的250年间所发生的事故因无记载,很难掌握准确数字。渔船姑且不论,据说每年仅商船就达几百至千艘,如将渔船也计算在内,可达此数字的3倍。”^[28]那些遭遇海难的人又由于“锁国”而被明令禁止归国^①,因此就形成一个流落海外的漂流民群体。正如“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的中国漂流事件拉开了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序幕,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应该从这次的漂流事件写起”^[29],1697年的传兵卫漂流事件也成为日俄关系史的起点。

另一方面,俄罗斯向远东扩张的政策也在日俄关系中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在控制了堪察加半岛后,俄罗斯更是以此为跳板进入了千岛群岛。日本方面虽然有林子平这样注意到了俄罗斯

^① 从光太夫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于归国的漂民主要还是通过严加管理的方式,以减低其对他人的影响,而非如规定的一律处死。

的南下动向的有识之士提出“要抢在俄罗斯之前对虾夷进行开发的主张”，但由于锁国时期的日本还没有认识到在近代国际秩序中领土的重要性，因而“日本直到俄罗斯南下千岛群岛为止，都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境’的概念”^[30]，最终使俄罗斯在千岛群岛顺利站稳了脚跟。1855年《日俄友好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就是以“民族国家”思想为主导的西方外交理念与“华夷秩序”主导的传统东方外交理念的碰撞。但《日俄友好条约》的订立并非日俄领土问题争端的终结，正是由于有俄罗斯这样一个强大外部威胁的存在，日本才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走上文明开化道路的必要性。当日本也走上“民族国家”道路，谋求对外扩张的时候，“锁国”体制下所划定的疆界就成为束缚日本扩张最主要障碍。冲破这种束缚即成为日本近代外交的主要课题，日俄两国围绕南千岛群岛问题争端的大门就此开启。

上海师范大学叶书宗教授就俄方材料提出的宝贵意见是本文得以成型的基础，谨向他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周启乾. 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89.
- [2] 朝尾直弘. 日本的历史 17 锁国[M]. 小学馆,1975:17.
- [3] 高桥幸八郎,等. 日本近代史纲要[M]. 谭秉顺,译.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52.
- [4] 大久保利谦,等. 从史料看日本的历史进程:近世篇[M]. 吉川弘文馆,1988:115.
- [5] 庆元英国书信,大久保利谦,等. 从史料看日本的历史进程:近世篇[M]. 吉川弘文馆,1988:116.
- [6] 唐·罗德里格致西班牙国王的书信. 大久保利谦,等. 从史料看日本的历史进程:近世篇[M]. 吉川弘文馆,1988:116.
- [7] 外国船只(中国船只除外)只能在长崎、平户停靠. 大久保利谦,等. 从史料看日本的历史进程:近世篇[M]. 吉川弘文馆,1988:119.
- [8] 孟晓旭. 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3.
- [9] 德川禁令考. 历史研究会. 日本史史料 3·近世[M]. 岩波书店,1997:131.
- [10] 法因别尔格. 俄日关系(1697—1875)[M]//周启乾. 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3.
- [11]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福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M]. 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19.
- [12] 《宽永十六年锁国的完成》条解说. 大久保利谦,等. 从史料看日本的历史进程:近世篇[M]. 吉川弘文馆,1988:130.
- [13]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 俄罗斯史[M]. 杨烨,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9.
- [14] 阿特拉索夫报告书. 平川新. 从俄罗斯史料看 18—19 世纪的日俄关系:第 3 集[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8:23.
- [15] 德国当为荷兰之误.《传兵卫报告书》,平川新. 从俄罗斯史料看 18—19 世纪的日俄关系:第 3 集[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8:28.
- [16] 传兵卫报告书. 平川新. 从俄罗斯史料看 18—19 世纪的日俄关系:第 3 集[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8:29.
- [17] 彼得一世关于组织第一次堪察加远征队的敕令. 平川新. 从俄罗斯史料看 18—19 世纪的日俄关系:第 3 集[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8:46-47.
- [18] 关于日本沿岸航海过程中对岛的记述以及与日本的接触方法. 平川新. 从俄罗斯史料看 18—19 世纪的日俄关系:第 3 集[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8:174-177.
- [19] 和田春树. 开国——日俄国界交涉[M].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1:55.
- [20]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 1 卷[M]. 南窗社,1976:72.
- [21] 林子平. 校正海国兵谈.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嘉永六年活字版.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ke05/ke05_00654/index.html\[EB/OL\]](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ke05/ke05_00654/index.html[EB/OL])
- [22] 周启乾. 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32.
- [23] 平川新. 从俄罗斯史料看 18—19 世纪的日俄关系:第 2 集[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7:17.
- [24] 山下恒夫. 大黑屋光太夫史料集:第 3 卷 伊势两漂流民的回忆·俄罗斯资料[M]. 日本评论社,2003:534-538.
- [25] 远征队长 A.K. 格拉斯曼给日本政府的书信. 平川新. 从俄罗斯史料看 18—19 世纪的日俄关系:第 2 集[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7.
- [26] 北海道厅. 新选北海道史:第 2 卷[M]. 清文堂,1937:416.
- [27] 皮尔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报告. 平川新. ロシア史料にみる 18~19 世紀の日露関係[M]. 东北亚研究中心,2007:184-190.
- [28] 横山昭男. 日本的锁国与漂流民[J]. 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2).
- [29] 孟晓旭. 日本漂流民(1644—1871 年)与清代中日关系[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2).
- [30] 长谷川毅. 北方领土问题和日俄关系[M]. 筑摩书房,2000:13.